

翻译史研究新思路：边缘语言翻译的外部史研究 ——评《(半)边缘语言间的翻译》

刘碧林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上海市, 200083)

摘要：葡萄牙里斯本大学的 Hanna Pięta 博士在国际人文社科类核心期刊索引 SSCI 与 A&HCI 收录的《翻译家》上发表了名为《(半)边缘语言间的翻译：波兰文学译入欧洲葡萄牙语的外部史概况》的文章，以 1855 年至 2010 年间波兰文学的欧洲葡萄牙语翻译作为研究对象，从外部翻译史的角度对相关文献内容进行整理并建立语料库，试图从语料库中对波兰文学葡语翻译的内容、方式、地点、译者身份以及时间进行总结。本文将对这篇论文进行内容介绍，评析该文章的特色与贡献，并总结其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启示。

关键词：边缘语言；外部史；多元系统论

中图分类号：H3 **文献标识码**：H3

一、引言

翻译史一直以来都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主要关注内容涉及译者背景（Who?）、源语文本所属的文化与时代（What?）、当时的翻译目的（Why?）以及翻译策略与需求（How?）^{[1]16-17}，但是实则翻译的历史研究涵盖的内容要比这些更加广泛，比如其还需关注翻译时间（When?）与翻译地点（Where?）两个内容。目前，大部分研究翻译史的学者还是将目光放在一些传统的研究思路之上，而这将阻碍该研究领域的发展，因此翻译史研究领域亟需注入新鲜思想，扩大翻译史的研究范围，为更多致力于此的学者提供更多的研究新路径。葡萄牙里斯本大学英语研究中心（University of Lisbon Center for English Studies）的 Hanna Pięta 博士于 2016 年在国际顶尖翻译学期刊《翻译家》（*The Translator*）上发表了名曰《(半)边缘语言间的翻译：波兰文学译入欧洲葡萄牙语的外部史概况》（*On translation between (semi-)peripheral languages: an overview of the external history of Polish literature translated into European Portuguese*）的论文，该文章不仅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同时还为翻译史研究提供了一条新颖且需更深挖掘的思路，即外部史（external history）的研究。本文将对这篇论文进行内容介绍，评析该文章的特色与贡献，并总结其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启示。

二、主要内容

文章共有六部分，分别为：引言、理论框架、方法论、翻译文学的葡萄牙系统简史、总结与发现讨论、最终评述与后续研究建议。文章开篇，作者首先解释了波兰语与葡萄牙语被视作边缘语言的原因，即根据 2014 年 5 月建立的《翻译研究索引》（*Translation Studies Bibliography*）涵盖的研究数据，其中英语、法语与德语都是研究的中心语言，三种语言的文献涉及量分别为 3278、1227 与 748 篇，而与波兰语和葡萄牙语相关的文献量分别仅有 129 与 293 篇。^{[2]354-355} 作者认为，边缘语言的翻译研究不应处于如此地位，反而应该得到学者们的重视。随后，作者提及了三位已经在译入葡萄牙的波兰文学进行过研究的学者，肯定了

他们在这一研究领域的贡献,但是认为他们并未有对于波兰文学的译入葡萄牙的翻译作品有意识形态、跨文化、社会政治方面的历史观概述,因此作者试图在其论文中能够梳理出 1855 年至 2010 年间波兰文学译介至葡萄牙过程中的方式以及普遍特征。

第二部分的“理论框架”包括两小节,作者分别对外部翻译史与多元系统论进行了介绍。首先,作者对外部翻译史与内部翻译史进行了简单区分,提到前者关注翻译的环境、体系、主体等内容,而后者讨论的是翻译文本、翻译修改与偏差等作品在翻译转换过程中涉及的内容。^{[3]9}此外,作者罗列了 Frank 提出研究外部史需要解决的是五个具体的问题:①什么被翻译了(尤其要关注文本体裁、作者等问题);②什么时候被翻译的(翻译频率如何,什么时候没有翻译进行);③翻译由何处产出(译作发行、分配地,发行商);④是谁翻译的(译者性别、培训、文化背景等);⑤是如何被翻译的(以什么方式,依据什么标准,原文是由源语直接译入译入语还是有中介语的参与间接翻译)。^{[4]808}然而 Pym 对 Frank 提出的这些问题进行了质疑,认为这些问题只能对史实进行描述,却没有对要这样来研究的原因进行解释^[5],因此作者将“多元系统论”作为解释此研究方法的理论支撑,从而弥补了阐释性不足的空缺。“多元系统论”的介绍分成结构、层级关系以及动态关系三个部分,作者也正是从这个三个层面阐述研究波兰文学译入欧洲葡语的外部史之重要性。

文章第三部分对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作者首先说明了语料库的局限与大小。针对目的语(欧洲葡萄牙语)文本,语料库在发行地、发行日期、主题分类、发行种类、目的语言以及发行模式方面存在局限;而对于源语文本(波兰语),也存在着作者身份以及源语方面的局限。而语料库虽然涵盖的文本数量较大,涉及 113 个文本,但这也使得研究只能泛泛而谈,并不能做到足够深入。紧接着,作者对数据分析模型进行了描述,根据第二部分中 Frank 提出的五个问题,融合了 Pym 提出的质疑(一系列“Why?”的问题),作者搭建出了含有 5 个层级的分析模型,每一层级包含的问题都是上一层次问题的延伸。文章第四部分是对第五部分研究发现的铺垫,作者在这一部分对葡萄牙翻译文学系统的历史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根据统计,葡萄牙在君主制时期(1820-1910)的翻译主要来自于法语;1910 年,国家从君主制转为共和制后,翻译发展缓慢但平稳;1926 年,第一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倒台后,书籍发行缓慢,这也影响到了翻译文学的发展;1933 年,新国家建立后,读者数量开始增多,因而从 1940 年代到 1960 年代间的翻译文学数量处于上升趋势;在 1950 年代,西班牙语取代了法语作为中主要翻译文学源语的地位。

第五部分是这篇论文的精华部分,也是该研究项目的核心部分。该部分包括五小节,每节标题就是 Frank 提到的研究外部史需要解决 5 个问题再加上 Pym 提到“Why?”的问题整合而成为新问题,即“**What+Why**”、“**How+Why**”、“**Where+Why**”、“**Who+Why**”与“**When+Why**”。作者从统计数据中得出,1855 年至 2010 年间葡萄牙的国外译作以叙述体文本为主(占语料库 82%),这与当时葡萄牙读者的阅读喜好有关;此外,20 世纪初期开始,翻译对象以个别作家的作品为主。根据作者统计的翻译的直(间)接性来看,1990 年

代以前，波兰语文学作品是先由其他语言翻译，再转而译入葡萄牙语的；在此之后逐渐转变为直接从波兰语翻译到（欧洲）葡萄牙语，这可能是由于1980年代懂波兰语的译者数量增多，还可能因为当时对于翻译文学的规定中不允许间接翻译。而谈及间接翻译的中介语，法语是应用最广的中介语，其次是英语，再次是西班牙语，而1990年代之后，英语代替了法语的地位，成为了被应用最广的中介语。根据统计数据，翻译地点呈现两个趋势：一是由拥有大量资金支持的大型、主流翻译公司主要翻译的内容，如已被广泛翻译的作家著作等；二是由资金支持不太充分的中小型专业出版社发行的翻译书籍，如波兰小众作家的作品等。译者的身份在初期没有太多记载，但是在1980年代至2000年代，一批波葡翻译的译者团队数量增多，而他们则是当时翻译工作的主力军。本部分的第五小节是占据篇幅最长的一节，作者在这一部分按照意识形态与文化背景，将翻译时间划分为君主立宪政体时期（1820-1910）、第一共和国（1910-1926）-军事政权（1927-1928）-国家统治（1928-1933）时期、新国家政权时期（1933-1974）、1974年后的葡萄牙四个阶段，因每一部分内容较多且叙述较为复杂，因此不再这里过多介绍。

作者在最后一部分对研究进行了总结与展望。根据作者所言，这篇文章的最终目的在于引起英语翻译研究学者对（半）边缘语言之间翻译的注意，她认为虽然这篇论文讨论的只是两种边缘语言的翻译，但是却可以为其他（半）边缘语言的翻译研究提供模板。除此之外，本文也为数据分析提供了集描述与解释于一体的研究模式，可以适用于其他类似数据分析之中。文章最后，作者还谈及了与这一研究相关的其他研究，供其他学者参考。譬如，本文作者已经对波兰文学葡译的外部史，为其内部史研究铺垫了基础；本研究是对波兰文学译入葡萄牙语进行研究的，其他学者则可以反过来对葡萄牙文学的波兰语翻译进行研究。

三、对中国翻译研究的启示

这篇论文从内容到结构，都体现了作者严密的逻辑与认真的学术研究态度，并且此文为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开拓了选题思路。就中国翻译学界而言，研究边缘语言翻译的学者并不多见，而将翻译外部史从翻译史中单独提出进行研究的学者也是屈指可数，而这篇文章对我国翻译研究有启发性的意义。

（一）中国非通用语种翻译研究

在中国知网（CNKI）上以“边缘语”或“边缘语言”为关键词搜索文献，能查到的论文数量非常有限，这说明这一研究对象在我国学界并未得到广泛关注。按照 Pięta 博士对边缘语言的界定，我们可以联想到在中国对外语进行划分的两个名称，即“通用语种”与“非通用语种”。2000年教育部批发的《关于申报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的通知》文件中，英、法、德、俄、日、西、阿7种外语被定为“通用语种”，而这几种语言以外的其他外语则为“非通用语种”。^{[61][74]}这篇论文对于边缘语言的界定是以《翻译研究索引》的研究语言占比为标准的；而我国对于非通用语种则是根据外语在中国的整体使用情况来界定的，其中设立该语种专业的高校数量也是界定标准之一。虽然标准不同，但是非通用语种确实不如通用语

种在中国应用广泛,因此非通用语种亦可被作为中国版的边缘语言。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非通用语种在中国的使用相较之前更加活跃起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 65 个,涉及 53 种官方语言,而这些语言中包含通用语 3 种(英语、俄语、阿拉伯语),而剩下的 50 种语言均为非通用语种。^{[7]15}就“一带一路”背景而言,对这 50 种非通用语种涉及的外译汉与汉译外翻译文本进行研究也是极有必要的。

(二) 中国翻译史的外部研究

“外部史”这一词与“内部史”由英国哲学家 Kuhn 在《国际科学史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中的“科学史”词条中提出,其中前者关注科学知识的发展过程,而后者考察科学在社会文化背景中的考察。^{[8]75-83}这两个概念早在 20 世纪就被提出,然而却未引起中国翻译学界的重视。在我国,翻译史常被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鲜有学者将其分为内、外部分来分别研究。邹振环曾在文章中对明末到清末的翻译史从内部、外部两个方面做过研究,但是内容太过笼统,并不深入。不过他在文章中对“内部翻译史”的研究对象进行了罗列,如翻译家生平考证、翻译作品、译本目录、译本版本、翻译家团体、翻译风格、翻译理论、翻译拍戏、翻译机构和翻译政策等,但他却未提及“外部翻译史”的研究对象,只是提供了翻译史的外部解释,即“寻找影响或决定翻译演变的社会环境和背景”。^{[9]21}此外,屈文生在其文章中对翻译史的内部、外部研究法分别描述为表现文学化以及史学化的两种研究走向,前者“通常以翻译人物、策略、思想、标准为主线”,后者“讲究史料、史论、史观”。^{[10] 833-834}这些学者提出的观点都对我国外部翻译史研究提供了思路与方向,但是却未见广泛学者积极响应。而 Pięta 的这一篇论文,又可以将外部翻译史这个研究领域重新拉入我国翻译学的视野之中,尤其对于研究如《道德经》、《庄子》等中国典籍英译或其他语言外译的学者,他们可以将对这些典籍的外译史分为内部史、外部史两个部分来分别研究,如此便可向学界展现更加清晰的翻译史研究成果;而研究外国文学经典译入中国的学者,亦可以采取同样的研究方法。不仅如此,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更加深入的交流与发展,我国与这些国家之间的翻译事业并将不断繁荣,而若能对与这些国家之间进行的翻译活动从外部史的角度进行研究,也将为我国的翻译研究做出巨大贡献。

四、结语

“边缘语言”与“外部史”是 Hanna Pięta 这篇论文的两个关键词,整篇文章也紧紧围绕这两个核心内容展开。文章脉络清晰,内容安排得当,由浅至深,结合外部史这一独特视角向读者介绍了波兰文学从 1855 年到 2010 年的(欧洲)葡语翻译情况。从学术贡献上讲,本文为翻译史研究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即边缘语言翻译的外部史研究,并且为想要做类似研究的学者提供了研究模板与数据分析模式。而对于中国翻译学界而言,这篇文章同样对中国的非通用语种翻译、中国翻译史的外部研究等方面具有启发性。总而言之,这一篇文章是值得从事翻译研究的学者学习、借鉴的好文章。

参考文献

- [1] Williams J, Chesterman A. *The Map: A Beginner's Guide to Doing Research in Translation Studies*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4.
- [2] Pięta, H. *On translation between (semi-)peripheral languages: an overview of the external history of Polish literature translated into European Portuguese* [J]. *The Translator*, 2016.
- [3] Frank, A. P. *Forty Years of Studying the American-German Translation Transfer: A Retrospect and Some Perspectives* [J]. *American Studies* 35. 1990 (1): 7-20.
- [4] Frank, A. P. *Translation Research from a 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 Objectives, Concepts and Scope* [C]. *Übersetzung. Translation. Traduction*.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4.
- [5] Pym, A. *Shortcomings i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ranslation* [J]. *Babel* 38. 1992 (04): 221-235.
- [6] 王雪梅, 赵双花. “一带一路”背景下我国高校非通用语种专业建设: 现状、问题与对策 [J]. *外语电化教学*, 2017(2): 91-96.
- [7] 王辉, 王亚蓝.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 [J]. *语言战略研究*, 2016(2): 13-19.
- [8] Kuhn, T. S. “History of Science” [A]. Sills, D. L.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s* [Z]. New York: Crowell Collier and Macmillan, 1968, Vol. 14.
- [9] 邹振环. 晚明至晚清的翻译: 内部史与外部史 [J]. *东方翻译*, 2010(4): 18-26+32.
- [10] 屈文生. 翻译史研究的面向与方法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8(6): 830-836+959.

A Novel Approach to Research of Translation History: External History of Translations between Peripheral Languages:

A Review of “On translation between (semi-)peripheral languages”

LIU Bili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83)

Abstract: Dr. Hanna Pięta of the University of Lisbon, Portugal, published an article entitled “On translation between (semi-)peripheral languages: an overview of the external history of Polish literature translated into European Portuguese” in *The Translator*, a journal included in two internationally famed indexes, SSCI and A&HCI. In her research, the Polish literature translated into Portugal from 1855 to 2010 was considered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rnal translation history,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content was sorted out and a corpus was set up. The author aimed to summarize the contents, methods, places, translator's identities, and times of the Portuguese translation of Polish literature from the corpus.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briefly introduce and evaluate this publication, and then summarize the enlightenment provided by Pięta's research.

Keywords: peripheral languages; external history; poly-system

作者简介 (可选): 刘碧林, 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学硕士, 研究方向: 文学翻译、翻译史。